

第一章 唇亡齿寒

●越南告急

19 世纪 60 年代初，同治皇帝承统登基以来，长期为内忧外患所困扰的满清王朝，此时似乎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相继被平息，心腹之患算是暂时消除了；洋务运动也已起步；清朝统治者与外国列强之间的了解也有所增加，一度出现了‘中外相安’的局面‘同治中兴’的说法也由此而生。

遗憾的是，所谓的‘中兴’局面虽非毫无凭据，但也只是昙花一现。国内的社会阶级矛盾并未缓解，外国列强也正在酝酿发动新的侵华战争。到 19 世纪 70 年代，清王朝统治者又不断为频频传来的边疆危机所困扰。尤其是法国侵略越南所引起的西南边疆危机，愈演愈烈，清政府穷于应付，找不到良策。

光绪九年十一月（1883 年 12 月），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侵略军 6000 余人，舰船数十艘及大炮 200 余门，向应邀驻守在越南山西的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

中国近代史上第三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由此拉开了序幕。

中法战争的爆发并不是偶然的。

自 19 世纪 70 年代起，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开始了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进程。列强对世界的争夺和瓜分也逐渐进入高潮。包括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在内的远东地区，成了列强激烈争夺的场所。列强对中国进行瓜分的前奏，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在新一轮的对外征服扩张的浪潮中，法国再次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作为一个老牌殖民帝国，法国的对外扩张活动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中叶。到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法国已经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地区建立了殖民地。殖民者掠夺来的大量财富，成为其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在赫赫有名的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法国便开始了工业革命。到路易·波拿巴建立的第二帝国时期，工业革命已基本上完成。19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法国已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强国。

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法国资产阶级对外侵略扩张的胃口也进一步扩大。为了成为欧洲的霸主，法国曾与普、奥、英、俄、意等列强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战争，同时，它对美洲、非洲和亚洲等地区的殖民侵略活动也丝毫没有放松。到 1870 年，法国拥有的殖民地面积已达 90 多万平方公里，成为当时世界上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殖民帝国。

同治九年（1870 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惨败，直接导致了第二帝国的覆灭和第三共和国的建立。尽管当时法、德矛盾十分尖锐，法兰西民族雪耻的愿望也非常强烈，但新掌权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权衡利弊，还是把对外殖民扩张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因为像法国这样的老牌殖民大国，是不会在新一轮的殖民扩张浪潮中甘居人后的。法国对外殖民扩张的积极鼓吹者、曾几度出任内阁总理的茹费理毫不掩饰地说：“难道法国只是大陆国家吗？殖民地领土的寸土寸地，对我们来说都是宝贵的，……放眼看看世界地图，看看许多大国，它们……都怎样急切地、怎样火热地在世界上建立自己的市场”，“殖民地是一个最有利可图的资本投放地”。

侵吞越南，并以此为跳板，进而染指中国西南地区，是法国新一轮殖民扩张活动的主要目标。

越南，古称交趾，又称安南，位于印度支那半岛东部，东、南两面濒海，北与中国的云南、广西两省接

壤，是中国山水相连的邻邦。越南地形呈狭长之状，南北长约 1600 公里，东西最宽处（北部）约 600 公里，最窄处（中部）仅 50 公里，总面积约 32.9 万多平方公里。19 世纪时，越南划分为南圻（南部 10 省）、中圻（中部 4 省）和北圻（北部 16 省）三部分，国都设在顺化。西方又称越南北圻为东京，北部湾因而得名东京湾。

其实，法国在越南的殖民扩张活动也由来已久。

早在 16 世纪末期，法国的传教士就开始在越南南部从事所谓的传教活动。在虔诚布道的传教士中，当然不乏借宗教之名为侵略扩张摇旗呐喊的殖民主义者，百多禄主教就是其中的代表。18 世纪 70 年代中期，百多禄即开始帮助以阮福映为代表的南方割据势力——阮氏集团训练军队。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百多禄作为阮福映的代表前往巴黎，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政府代表签订了《法越攻守同盟条约》，其主要内容有：法国派兵援助阮福映；法国如在东亚遭到攻击，阮福映则出兵相助；越南割让土伦和昆仑两岛给法国；法商在越南享有免税和垄断贸易的权利。此外，百多禄还上书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建议把越南作为法国在远东殖民扩张的基地。随后，路易十六以此建议为基础，制定了在东方进行殖民扩张，建立一个“法兰西东方帝国”的庞大计划。

然而，路易十六的“东方帝国”的美梦做了没多久，法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几年之后，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然而，阮福映却在国内战争中渐渐占了上风，并最终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恢复了阮氏王朝的统治。

19 世纪初，当法使前往越南，提出履行 1787 年条约的要求时，阮氏王朝以法国未能按条约及时提供援助为理由，予以拒绝。在阮氏王朝看来，割地、通商对维护其封建统治并没有什么好处。这一举动激怒了志在必得的法国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 年），法国以越南排斥天主教为理由，派遣军舰炮轰越南南部港口。法国对越南的武装侵略由此开始。

咸丰六年（1856 年），法国与英国组成联军，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与此同时，它又借口其传教士被杀，与西班牙组成联军向越南发动了进攻。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法国将从中国撤出的军队调往越南，进一步扩大侵越战争。同治元年（1862 年），越南阮氏王朝被迫与法国签订了《柴棍条约》（即第一次《西贡条约》），该条约规定越南割让边和、嘉定、定祥三省及昆仑岛；开港通商；赔款；不经法国允许，越南不得割让土地与他国。

这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是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的开端。

一年后，法国又强迫柬埔寨签订了不平等条

约。由于柬埔寨已成为它的保护国，法国顺利地控制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湄公河下游地区。

到了同治六年（1867 年），越南南部即南圻各省，也已全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由法国总督直接统治。

法国侵略者吞并了南圻后，又将侵略扩张的魔爪伸向北圻，这既是为了扩大在越南的殖民势力范围，也是为了打开通向中国西南地区的门户。当时，法国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明显不及英国，其他列强也纷纷加紧在中国的扩张活动，如果占领了北圻，法国就可在中国的扩张活动中处于较有利的位置。对此，法国驻越南海防领事非常“清醒”地认为：“法国必须占领北圻，……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出现在中国腹地的人。”的确，如果要从外部进入中国的云南和广西地区，再也找不到比从越南出发更为便捷的地方了。

实际上，法国侵略者在与阮氏王朝签署第一次《西贡条约》时，就已经取得了在湄公河上自由航行的特权，其主要目的就是想把湄公河作为进入中国云南地区的通道。在同治五年到七年（1866—1868）间，法国殖民者组织了一支规模庞大的探险队，由西贡出发，开始了从湄公河进入中国境内的探路活动。由于湄公河的上游即中国境内的澜沧江，滩多流

急，不宜通航，探险队只得辗转返回西贡。但是这次未成功的探险活动却意外地得到了一个收获，法国殖民者发现，越南北部的红河是进入中国的最理想通道。

这一消息使法国冒险分子、军火商堵布益大受鼓舞。他成功地进行了从云南通过红河进入越南北圻的航行。堵布益的这一行动又进一步刺激了法国殖民者对越南北圻的侵略欲望。同治十二年十月（1873年11月），由安邨率领的法国远征军攻占了河内，接着又相继占领了海阳、宁平、南定等省，并准备继续西进，攻占中越边境上的重要交通门户保胜（今越南老街）。这样，法国舰船就可以从东京湾溯红河而上，直接驶入中国云南。此时，法国对越南的殖民侵略活动，不仅给越南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已威胁到阮氏王朝的统治；而且也使中国西南边境处于‘藩篱’尽失、危机四伏的境地。

阮氏王朝在向法国侵略者妥协、退让的同时，又把期望的目光转向中国，希望依靠北方邻国的援助，免遭覆亡的命运。由于派兵入越参战是件复杂的事情，估计清政府难以立即作出答复，阮氏王朝首先向驻扎在保胜等地的黑旗军发出了邀请。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最早站到了助越抗法的前列。

●黑旗军抗法

刘永福(1837—1917),广东钦州(今广西防城)人,出身于一个贫苦人家。13岁时,他就在左江航道上做船工。少时艰辛的生活,将他磨炼得勇敢而坚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后,广西地区的天地会也纷纷响应。此时年仅20岁的刘永福也投身到农民起义的洪流中,由于勇敢善战,很快成为一支起义队伍的首领。

19世纪60年代中期,清政府在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后,又调兵遣将,大举进攻广西天地会起义军。此时,刘永福率领一支200多人的队伍,来到广西西部靠边境的安德,投奔在当地称王的太平军吴亚忠部。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以及起义军内部的矛盾,太平军难以阻遏清军攻势。刘永福被迫率其部进入越南北部山区,在保胜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一天晚上,这支部队在靖西安德北帝庙前,以七星黑旗祭拜誓师,后来就将此旗作为军队的标志,史称黑旗军。黑旗军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队伍由200余人迅速增加到2000余人。刘永福把这支部队编为3个营,任命黄守忠为前营管带,吴凤典为左营管带,

杨著恩为右营管带。

黑旗军人越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注重发展当地的生产。同时，他们还以除暴安良为己任，在较短的时期内，消灭了盘踞在越南北部靠近中越边境地区的几股封建割据势力和地方恶霸。黑旗军因而深受当地百姓的拥护和支持，被称为“仁义之师”。

黑旗军在越南北部翦灭封建割据势力的斗争，客观上也维护了阮氏中央政府的利益，受到了阮氏王朝的重视，刘永福因此被授予“七品千户”、“保胜防御史”等爵衔。

面对清政府的镇压，刘永福是否应率部避走越南，迄今仍有不同的看法。有一种说法，刘永福在清军的进攻面前，率部脱离吴亚忠领导的起义军，客观上削弱了革命力量。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贪生怕死的行为。

其实，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镇压后，国内的反封建斗争实际上已陷于低谷。既然暂时不可能打退清军的进攻，刘永福率部避走越南，确属明智之举。何况，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还揭开了中、越两国共同抗法斗争的重要一页。这一结果是刘永福、清王朝和阮氏王朝所始料不及的。

刘永福英勇抗击法国侵略者的行动，也充分说明他并不是个贪生怕死之徒。

刘永福率部进入越南后，耳闻目睹法国殖民侵

略者的暴行，进一步加深了对越南人民抗法愿望的了解，因而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阮氏王朝的邀请，并星夜兼程，跋山涉水，迅速开赴抗法斗争的前线。

1873 年 12 月 21 日，黑旗军与法军在河内郊外进行了第一次较量。

刘永福率部千余人，在离河内西城门 10 里处安营扎寨，与越南北圻军务大统督黄佐炎率领的万余越军会合，迎战法军。

法军统帅安邨，被称为“法国有史以来最勇敢和最热心的探险家”。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安邨横扫河内及其三角洲地区。对此役的结果，他成竹在胸，认为这只不过是他在越南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个小插曲。

安邨踌躇满志，根本没有把黑旗军放在眼里。不料，当安邨率法军出河内西城门不远发动进攻后，刘永福指挥黑旗军奋起还击。这支装备简陋的中国非正规军，却使安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法军迅速溃退，直奔西城门而去，安邨也就由前锋变为了后卫。而黑旗军追击的速度更快，在离城门尚有半里路时，精疲力尽的法军被黑旗军赶上，勇敢的安邨瞬间成为黑旗军刀下之鬼。

黑旗军首战告捷，共击毙法军数百人，缴获不少枪支，沉重地打击了法军的侵略气焰。法军余部因惧怕黑旗军，只得龟缩河内，死守城池，不敢轻举妄

动。刘永福则指挥黑旗军绑扎云梯，准备强行攻城，直捣法军腹地。

遗憾的是，阮氏王朝因担心遭致法方的进一步报复，下令黑旗军与越军退兵，丧失了全歼河内法军的极好机会。

同治十三年（1874 年），阮氏王朝在法国的威逼下，于 3 月 15 日签订了《法越和平同盟条约》（即第二次《西贡条约》）。此条约的中心内容是开红河通商，将越南完全置于法国的卵翼之下。

刘永福因作战有功，被阮氏王朝授予“三宣副提督”之职，管理宣光、兴化、山西等省，据守红河上游，成为法国侵略者的心腹之患。

19 世纪 80 年代初，绝不轻易放弃殖民扩张计划的法国政府，决定再次扩大对越南的侵略，以打通红河上游。光绪八年二月（1882 年 3 月），法国西贡殖民当局派遣一支由 12 艘舰船组成的舰队，开赴河内，重新发动对北圻的进攻。这支舰队在交趾支那海军舰队司令、海军上校李维利指挥下，于 1882 年 4 月，攻占河内城。1883 年 3 月，又攻占南定。

李维利深知法军此行的根本任务是要消灭黑旗军，否则，红河是不可能被打通的；此外，他还要为 10 年前法军的惨败报仇。为了显示决心，李维利特别悬赏 1 万元，捉拿刘永福；如果攻取黑旗军根据地保胜，则可再奖赏 10 万元。

阮氏王朝不得不再次请求黑旗军前来阻遏法军的行动，以免北圻完全为法军所占。

刘永福虽对阮氏王朝屡次向法国妥协心怀不满，但在危急关头，仍以大局为重，再次率部赶赴河内抗法前线。

1883 年 5 月初，3000 名黑旗军将士“慷慨誓师”，决心“为越南削平敌寇”；“为中国捍蔽边疆”；与法军再决雌雄。

李维利也许是吸取了他的前任的教训，不敢轻易出战。黑旗军开抵河内城郊后，法军一度闭城不出，而黑旗军又缺乏攻城的必要条件，双方僵持不下。为把法军引出城外，刘永福向法军下挑战书，但李维利仍不上钩。直到黑旗军攻打并焚毁了河内城外的法国天主教大教堂，使法军失去了情报来源，李维利终于沉不住气了。

5 月 19 日，在河内城西二里处的纸桥，黑旗军与法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天刚蒙蒙亮，法军就开始发动了进攻。法军装备精良，不仅拥有快枪、机枪，而且还配备有大炮。纸桥西面黑旗军的驻地首先遭到法军大炮的猛烈轰击。而黑旗军的武器主要是大刀和火药粉枪，以及数量不多的快枪和平滑小炮，在武器装备上显然处于劣势。

炮击过后，法军正准备冲过纸桥，却遭到黑旗军

炮火的反击。冲在前面的法军副司令韦医刚到桥上，就中了致命的一弹。李维利只得亲自担当起前线指挥的重任。

法军冲过纸桥后，黑旗军杨著恩部边战边退，假装不是法军的对手。其实，这是刘永福事先设下的圈套，黑旗军兵分几路，早已布置了埋伏圈。当法军大胆地向前进攻时，突然三声号炮，正面的黄守忠部和左边的吴凤典部向法军发起了袭击，假装阵亡的黑旗军“死尸”，也突然平地而起，一起形成了对法军的包围。

近距离作战使法军武器的优势无法发挥，而黑旗军的大刀则大显威力。黑旗军将士奋勇杀敌，杨著恩双腿和右手中弹受伤，仍坐在地上用左手打枪，击倒 10 多个敌人，直至胸部中弹，壮烈牺牲。黑旗军攻势如排山倒海，波涌涛翻，直杀得法军目瞪口呆，心惊肉跳。李维利也在混战中被黑旗军击毙，落得与其前任安邨的同样下场。

纸桥一战，法军死伤 200 余人，正副司令均未能生还，损失惨重。

黑旗军取得纸桥大捷后，声望进一步提高，阮氏王朝提升刘永福为“三宣正提督”之后，在越南军民的支援下，黑旗军又相继在怀德、丹凤等地重创法军，威震四方。

就在应邀助越的黑旗军屡挫法国侵略者的同

时，由法国海军少将孤拔率领的舰队攻占了越南都城顺化。阮氏王朝此时正逢国王阮福时病死，宫廷内江，政局不稳，在法军的威逼下，于 1883 年 8 月 25 日签订了《法越顺化条约》。这一条约实际上使整个越南最终成为法国的所谓保护地，割断了中越间的密切关系。

此时，法国自以为已是越南的主人，得意忘形地要求清政府承认这一既成事实，并以所谓的条约为依据，准备用武力消灭或驱逐在越南境内的黑旗军和清军，并进而侵犯中国的西南边疆。

中法关系因法国对越南的侵略及对中国西南的觊觎而日趋紧张，战争阴云笼罩西南边疆，清政府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 清廷和战两难

法国对越南的侵略及其造成的影响，实在是给清政府出了道棘手的难题。

在 19 世纪 70 年代，越南问题尚未引起清政府的足够重视，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清政府还被其他一些重大问题所困扰着。

在东南地区，先是美国借口“罗佛”号在台湾海面失事，7 名水手在当地遇害，派遣军队在台湾南部

的琅玕(今恒春)登陆。这一侵略行动虽被击退,但美国并未放弃对台湾的野心,只是由于力量不足,才转而支持日本对台湾的进攻。

在日本对外侵略的蓝图中,首要的目标就是征服我国的台湾和当时尚为清王朝藩属地的琉球群岛。1874年,日本公然武装侵犯台湾,并于1879年强行吞并琉球,由此引起了中日之间的多次谈判、交涉。

在西北,清军刚刚把陕甘回民起义镇压下去,又在左宗棠的统帅下,开始了进军新疆、平息阿古柏叛乱的行动。同治十年(1871年),沙俄又乘西北边疆动乱之机,派兵侵犯并占领新疆的伊犁地区。由此而引起的中俄关于伊犁问题的谈判,也是一波三折,进行得颇为艰难。

同时,英国侵略势力又开始向我国的云南、西藏等地区渗透,并利用所谓的“马嘉理事件”,迫使清政府于光绪二年(1876年)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这一条约不仅进一步增开了通商口岸,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租界内洋货免厘等特权,还允许英国可以派人经甘肃、青海、四川等地入藏去印度,或由印度入藏,从而为英国以后入侵西藏和西南地区,提供了便利条件。

因此,当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于光绪元年(1875年)照会清政府,将所谓的第二次《西贡条约》的内容

通知总理衙门后，中方官员虽对法方的观点进行了驳斥，但因忙于处理其他边疆危机，未能对法国在越南的侵略行为作出进一步的反应。

然而，到了 80 年代初，随着法国对越南侵略的进一步加深，以及清政府面临的上述几个问题不同程度地得到解决或缓解，越南的现状终于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度不安和关注，也因此不得不在战与和之间作出选择。

坦率地讲，对清政府而言，要在战和之间作出选择，是极其艰难的。因为战有战的理由，但战也有战的难处；和也不是轻易能得到，同样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中越两国在地域上山水相连。从国防角度讲，中国西南地区的安危与越南的存亡休戚相关。由于法国入侵越南是与其对云南、广西等地的觊觎密切相关的，如果任凭法国完全占领越南，则中国西南必将失去安全的屏障，边疆危机也将进一步加剧。清政府的部分官员，对‘唇亡齿寒之患’的严重性，还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尤其是西南地区的一些督抚，对此更是有直接的感受。

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时任广西巡抚的刘长佑就明确指出：“法国之图越南本非一日，法人之不忘粤西亦非一日矣。”他提醒清政府关注法国在越南的图谋，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中越两国间不仅在地域上相毗邻，经贸交流不断，人员往来频繁，而且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政治关系，这就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宗藩关系。中越间的宗藩关系始于北宋初年，到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已延续了近千年。宗藩关系的内涵是：藩属国的国王继位，需经宗主国的册封，才算取得合法的地位；藩属国需定期向宗主国进贡；宗主国则负有帮助藩属国维护统治秩序的责任。

有人认为，中越间的这种宗藩关系，与法国对越南的侵略和控制没有根本的区别。言下之意，对越南而言，法国的入侵并没有造成什么新的损害，因为在此之前，越南早就被其北方邻国所控制。

不可否认，中越两国间存在的这种宗藩关系，主要是由于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实力的差距所造成的，是一种特殊的封建等级关系，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平等性。但是，这种宗藩关系显然不能与西方的殖民统治相提并论。如清王朝对越南国王的册封，实际上仅是对既成事实的认可，即谁控制了越南中央政权，清王朝就予以承认，并不具体干涉其内政。同时，清王朝也不染指越南的领土，不谋求经济上的特殊利益。如越南使臣朝贡时，清王朝回赠的礼品，其价值往往大大超过越南国王进贡的物品。

由此可知，宗藩关系并未对越南的自主权和经济利益构成直接威胁，越南基本上仍是一个领土完